

(一) 留学先驱容闳与家乡

【容闳与南屏容氏家族】

(容汉詮夫妇访谈录)

时间：2006年7月20日

地点：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，容汉詮先生家中

受访人：容汉詮和他的夫人

受访人描述：容汉詮，男，73岁，容闳的堂侄孙，退休后任南屏镇退休教师党支部书记

采访人：朱凌志 卢树鑫 陈习文 沈桂道 祁梁

整理人：陈习文、沈桂道、赵立彬

我的亲家是台湾人，我也是台湾人，只不过回来得早。我是1998年退下来的，1996年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回来办这个边防证，把这边先安顿好再回来，要不然你一退下来连房子都没有。这是老房子，是老祖宗的家。我有两座家产，这里一座，南屏街口那里还有一座。这个房子原来跟对面的房子一样，是老式房。

这些房子是原来就有的，以前是老平房，后来政府把它们全都拆掉重建或改建。政府设计的，面积不能太大，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庄园整整有400平方米，600平方米是一亩地嘛。400平方米的庄园拆掉后，现在这个地基是100平方米，这个两层楼是200平方米。剩下的300平方米用来种果树，（看着容夫人）这些果树都是她种的，她是园艺专

家，我是搞森保的，整个都是她搞的，建房、栽树啊，很辛苦。

我是从台湾到新加坡、再到澳门、最后到大陆的，真正在大陆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，一直到现在。参加工作有42年，1958年去宁夏，本来我1956年毕业分配去了中央林业部，后来支援大西北，我就报了名，结果一待就是40年，在宁夏就待了40年。1998年退下来以后就开始待在这里，乡里叫我们出来搞点工作，我就当了南屏镇退休教师党支部书记。在此之前，我生在台湾，7岁离开台湾到新加坡去，一年、二年级在新加坡上学，三年级回来南屏，一直在甄贤小学念到毕业，现在我是甄贤小学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。1946年到1952年在澳门岭南中学读书，2003年7月我和老伴还去岭南中学我的母校看了一看。

澳门高中毕业以后回来大陆念书，在广州华南农院，现在叫华农大，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央林业部。中山大学在康乐，前身是岭南大学，是教会学校，解放以后把岭南大学取消了，叫中山大学。原来在石牌的老中山大学，就搬到康乐那里。我们是头一批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，办学啊什么的，都是苏联那一套，答辩、口试、笔试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个时候学习特别认真，要培养“又红又专”的专家。整个都是接受苏联的那一套。1952年调整，我们就1952年进大学。那时候念大学很简单，吃饭不用钱，呵呵，学费都不用收。1953年开始意思意思收点伙食费，我记得是4块钱，不过在那时应该说是4万块钱，一万就是一块钱，因为那时币制还没有改革。1955年才开始币制改革的，一块就是一块，过去的4万太厉害了。出来工作工资是36万，听上去好多，呵呵，其实就是36块钱。

容闳是我堂叔公。跟容祺年（容汉诤的祖父）是堂兄弟，黄晓东写的《容闳传》里专门记载了他的事。对于容闳小时候的一些事情，我知道的不是很多，我只知道祖父的情况。我的太公叫麟康公，是清代的高官，至于什么高法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的爷爷是麟康公第五个儿子。梁振兴叫我写《祖父容祺年在台湾》的时候，我一并交给他了，你们要参考的话，就去找来看看，6500字。等下带你们去看看容闳故居，也

很近。

我祖父跟容闳是堂兄弟，虽然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美国，但经常来往。我祖父是搞商业的，生意都很大，就专门买了块地在台湾给那些两广——广东、广西的人。人家自愿到台湾打工，死掉没有地方安葬，那就免费给他安葬。以前没有火化，只有山坟，所以我祖父在台湾很有名。梁先生就叫我写一写《祖父容祺年在台湾》。

甄贤小学过去的教室现在是办公室了，印象很深，现在都还在。老房子一点都没有改动，但是旁边盖了座楼，是南屏镇政府，港澳同胞修建的。现在校址要换了，换到一个凉水井那边，已经盖了房子。原来的小学作为容闳的博物馆。

容氏家族，一般人叫长（chang，第二声）房街，应该是长（zhang，第三声）房，长子嫡孙嘛，我是长（zhang，第三声）房。拍戏也叫长（chang，第二声）房，这个长（chang，第二声）什么的都能长（zhang，第三声）嘛。我们祖宗祠堂都有嘛，叫盛茂祠，拐过几个街就是。不过现在给人租掉当小卖部了，路过你也可以看。族谱原件现在还有，在南屏社区里边。

我小时候在这里，甄贤小学就等于是容家的学校，姓容的进去不但不收学费，还免费送给纸笔、书本。过去的容、林、张、郑是四大姓，姓蔡啊，姓杨啊，都有啊，噢，北山姓杨的多，杨匏安嘛，这边就是容闳、容国团嘛。这些大姓的整个家族形成一个很具体的聚集点，我们小时候，盛茂祠整条街都是长房的，在南屏街口那一带定居，四房和六房合起来祠堂，一般叫四六祠。一房二房三房有武光祠，文革时候破四旧，整个都拆掉了。一房、二房、三房一个祠堂，四房、六房一个祠堂，五房就死绝种了，没人了。我们长房专门一个祠堂。以后不行了，打工人多，南屏这个人口是十万，外来打工占八万，剩下两万多才真正是南屏的，姓容的才一千多人。一千多人啊，没有多少。我们小时候在南屏，整个南屏姓容的才三四百户。然后就走了，走得差不多。经过文革、60年低标准时，走了一些，偷渡到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，外国如美

国啊，都有。这些人现在发展得不错，虽然是偷渡过去的，但法不责众嘛。走掉那批人现在主要在香港、澳门，每年回来捐款。过去的情况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，历史就是这样了。现在去澳门要办证了，但农民生活也多好了，还跑到澳门干啥？现在澳门人吃的用的都到这边来。所以说政策这东西呢，天下有地，什么都没有变过，为什么以前连饭都吃不饱，现在能家家盖楼啊，就是政策不一样嘛。

容、林、张、郑这几个之间关系还是比较融洽、比较和睦的，但我八九岁的时候，听老人说，和北山姓杨的是死对头。容、杨水火不容，一见到就打架，打人原因不清楚，不考证它。解放以后慢慢融洽了，以前说是姓杨的，姓容的不让进他村，姓杨的不能到南屏，一来就叫整条村整条巷全部姓容的都上去打。有拿出家伙来的，有赤手空拳的，很惨的。后来这种情况就没有了。这些年甄贤小学也有姓杨的念书了，搁在以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两姓之间不通婚的，打架还通婚？

姓容的过去很团结，专门搞甄贤学校纪念容闳，现在已经建校 137 年了，是老校了。据我了解，全国小学从来没有校友会的，中学，大学倒有很多，但我们这里挂了个“南屏甄贤小学校友会”的牌子，全国来讲，小学校友会也只有我们这一家，呵呵。

我这个人比较内向，不愿意介绍我的情况。退下来了嘛，要争工资，工资原单位发的；要争荣誉，过去的荣誉多得很，现在该收起来的就收起来了。我一般不喜欢串门啊什么的，现在我爱人在家，我陪着她。她一辈子辛苦，我所谓的事业达到如今这个状况，一大半都是靠她支撑的。她本身已经是副教授，上课、做家务、带小孩，什么事都是她在做，很辛苦，所以现在我要陪陪她。在宁夏那边的生活真的好艰苦，但也正是在艰苦的情况下才能出东西，你看那片大沙漠，过去沙柳啊、红柳啊、病虫害啊没有研究，我就去搞、去研究，出了很多成果。1985 年国际林联评我为“世界森林病虫害专家”。去到那里，梁振兴就说：“哎呀，容教授你是重量级人物啊！”我说：“哪里哪里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梁振兴对我的印象最深了，为啥？他弄文史材料。珠海的人物，

容闳当然是世界级的，可活着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，是国家级的就很了不起了。但是我不以这个为荣，也是鞭策自己，我能干的事情就尽量去干，是吧？以前学习的时候，学的那套防治病虫害的理论，受苏联的影响很大。苏联就是那个米丘林、李森科，他们在遗传学方面的确很有一套。但后来由于政治关系，苏修苏修的，搞臭了，但是我们觉得向他们学习的技术很好啊。过去我们是死记硬背大题目，但是苏修那招不是哦，重点的病害病理昆虫，抽签，这几题里面主题哪个、副题哪个，抽到以后，你对答如流；突然间，好几个老教授问你一下，呃，你哑口了，好，不及格，很严厉的。要知道，它是口试和笔试并重，而以口试为主啊。教授抓学生，脑筋一转，看到你里面有问题，马上出言处理一下，你答不出来呢，最多给个及格。优、良、中、差四级，我一般病害昆虫科目都是优。昆虫学方面我们有全国一流的教授蒲蛰龙，病理方面有世界有名的黄龙病专家林孔湘，这两个专家都对我很欣赏。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林业部，当时只有我一个分到中央级，是优材生。所以在学习中打好基础很重要，基础打不好的话出来就是蒙混过关，不行的。我的学习，就是按照又红又专的目标奋斗的。不过旧时的情况是有海外的关系的话，就不行了。我到林业部以后，也不知趣。我1956年一进林业部就提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人家一看有海外关系，也不敢说，我只好靠边站。这种情况在到了宁夏之后也没有改变，我教学好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领导说小容教学不错啊，参加我们中共吧。我又写了一个申请，结果人家一看，哇，有海外关系，我又只得靠边站，呵呵。我这个入党申请，写了三遍。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，那时邓小平上台，马上说“海外关系是个宝”，我就加入中共了。1989年我参加台盟，台盟是中央出于联系工作方便的考虑要我参加的。我问行不行啊，人家说行，我就填了一张表，三天就批下来了。回到宁夏去办手续，到宁夏后人家一看——“好啊！这是宁夏的光荣！”就马上补上去了。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的经历的中心就是一个——奋发图强。学生时代，就要好好学习；工作呢，越困难的地方就越有财富，一张白纸才好写

嘛。这么大的沙漠叫你研究病虫害，里面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森林的。人家一看，容老先生的身体是锻炼出来的。所以我最后还是要感谢共产党给我这样的机会进行锻炼，才让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。我很感谢共产党，呵呵。那里喝水哪里有这个高山茶给你喝啊？一看那里的水，牛马粪都在里面，泼拉一下，打点水就给你喝。所谓涝坝，就是牛马粪啊、尿啊，都流在里面，水贵如油啊。比较远的地方，人家留你吃饭，不给你水喝，水很宝贵。我这个适应性很强，放在哪里都能生根。

我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生活，7岁时就在一起，爸爸也在台湾工作。当时我祖父在台湾已经很有名了，巨贾嘛，钱很多，所以专门买地送给穷人，发大水的时候又捐出3000两白银，当时台湾的一些人就叫他“台湾第一佬”，谁也不感到很吃惊。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台湾搞革命的时候，大部分钱都是我爷爷给的。我祖父很有威信，也很爱国，他将“毋忘中华”作为一种家训流传下来。

我初中高中都是在岭南读的，我1946年至1952年都在岭南读书。教材用的是英文原版，当时代数、物理、化学全部都是牛津的书，教学条件很好。岭南中学是岭南大学的附属学校，是教会学校，也可以叫贵族学校，每年的学费1000多块。1000多块很厉害了，当时2000多块就能修一间房子盖一栋楼了。过去我的家底都是老祖宗供养的，不然哪有这样多钱念书啊？所以一般而言，一个人念书一定要找一个好学校，一般的学校不行，误人子弟。岭南中学那时候是全国，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，所以就把我们培养好了。我这点英文水平，就是岭南高中毕业的水平，呵呵。那时候学的，以后一直都有用，翻译的时候都用得着。同学也都很好，岭南中学校歌歌词里面就有“一切岭南人，团结奋发图强”，呵呵。校歌教育一切岭南人，你看多厉害，呵呵。我父亲是岭南大学毕业的，是水稻专家。我也是大学毕业，我几个儿子也是大学毕业，呵呵，她（指容夫人）也是大学毕业。

我小时候这里没有外国人过来传教，当地的有，叫牧师，在南屏街口还专门有个福音堂。牧师是从广州或者外地来的，没有外国传教士，

都是上面教会派下来的，派中国人过来传教。至于当地人对这些传教士的看法，信仰自由嘛，有些人拜菩萨，有些人拜观音，互不干扰。有些老和尚来化缘，敲敲门，有人说我们是信教的，老和尚就走了，互相没有打闹，因为在南屏信仰自由，无所谓的。那时信教的人很多，走掉去港澳的那些人都是信教的。留下来在南屏的这批人，没有听说有信教的。经过文革，文革很厉害啊，把这些人消灭掉了，以后这些都不敢公开了，但他也不拜菩萨，在里面信教、在里面念经也一样。

容氏家族出了那么多人才，主要是靠自我奋斗。像我们在宁夏时，认为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就踏踏实实地奋斗。有一些人说，是风水的缘故。南屏是人杰地灵，很多第一句开头就是说什么南屏人杰地灵，呵呵，当然，风水讲的是客观的条件，主要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，如果你吊儿郎当的就不行。像我，一生无怨无悔，学习认真，工作认真，退休还退而不休，就应该自强不息，无私奉献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容氏家族向来都重视教育。为啥呢？我们盛茂祠重男轻女，遇上节庆日要分猪肉，女娃娃没有，男娃娃就有。小学毕业一份，中学毕业一份，大学毕业一份，博士一份，就是作为鼓励。我们家每次都是分最多，用大箩装，呵呵。这样的措施鼓励人家努力念书工作，最高的有分8份，一份就10斤啊，半条猪就没了，呵呵。甄贤学校原来是我们的家族学校，外姓、杂姓不收的。读书不用钱，书包、书本什么的都不用钱，都是学校提供的。祖宗那里有很多房地产，就把田租给农民，然后收租。南屏村过去周围面积很广，几百亩水稻地都是我们的，租给别人种。但是文革的时候把祠堂砸了个稀巴烂，都是老地主了嘛，所以现在祠堂里都没有神位了。

我觉得南屏这边对于故居、甄贤小学的保护和对他的宣传力度是不够的。甄贤小学是容闳一手创办的、距今有137年历史的学校。别说容闳，广东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人，哪个不是顶尖的？你看他们现在有专门的什么什么吗？没有啊，都是宣传不够，他们都是近代很有名很有名的人物。